

挣扎与诀别

欧美现代的“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这一文明的动力，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愈发显得势不可挡，其中在亚洲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在70年代，亚洲出现了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Es），到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东盟（ASEAN）开始追赶上属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取得了令人惊异的高速经济增长。在NIEs明显崛起的时候，小岛清总结出了“雁阵型发展”模式，对亚洲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预测，后来更出现了所谓“亚洲世纪，亚洲时代”之类的说法。⁶²

对于上述变化，松本健一在报告中分析认为，对60年代以前的亚洲，人们更多地强调其贫困、停滞和非民主性等负面因素，而进入80年代，就转向了正面评价，如经济发展及支撑发展的活力，以及民主化的进展等等。⁶³但是，松本所说的亚洲的形象走向正面的70年代到80年代，实际上也是以日本为首的“头雁”以及整个亚洲地区“无思想的时代”带来的时期。在实现物质丰裕的背后，失去了等身大的世界，生命的所在变得模糊，可以说是一个日暮途穷的时代。

与此相比，松本所说的以贫困、非民主等负面形象为主的50到60年代的亚洲，明显存在着对欧美现代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进行抵抗的思想潮流。特别是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带有象征意义。会议发表的“共同宣言”称：“田野和森林曾经横行着外国野兽的亚洲和非洲，已经成为决定着世界未来的自由而又值得尊敬的力量。……在万隆敲响的宣告亚非黎明的宏钟，从几百年屈辱的生活中唤醒了17亿人民。”⁶⁴

当时的亚洲和非洲的确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但那也是亚洲和非洲接连打破欧洲列强一百多年的黑暗殖民统治而取得独立的时代。因此，从亚非内部来看，50年代到70年代前期正是其迎接“黎明”的时期，而决非负面形象。

1961年，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弗朗茨·法农临死之前，他呼吁“与欧洲梦诀别，与不断高喊着人道的欧洲诀别”。⁶⁵对于亚非拉（A·A·LA）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欧洲既是带来帝国主义统治的令人憎恶的敌人，又是衡量人类进步的决定性标准，是一种“梦想”。因此，在经常对欧洲进行抵抗的同时，又总是存在着“抱有期待将会被出卖”的反复，在这种反复中，亚非拉世界的“抵抗的牙齿”不断被拔掉。法农的宣言正是要结束这种期待和背叛的反复。但是，这一“诀别宣言”同时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充分的信心摆脱对于欧洲现代的“失败”，将难以进行真正的“诀别”。

法农的宣言与毛泽东的中国同样缺少对于失败的自觉。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成为贯穿于60年代整个亚非拉世界的主旋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并且在欧美世界内部如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中出现了像马尔科姆·X、迈克尔·杰克逊之类的共鸣者。进而，萨米尔·阿明和A·G·弗朗克等人的依附理论，主张只要亚非拉世界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框架之内，就无法摆脱依附化加速的压力，这从根本上意味着只有通过“与欧洲诀别”，才能摆脱依附的命运。⁶⁶这样，与欧洲诀别的思想一度超越了亚非拉而在世界范围赢得了共鸣，在欧美国家内部也推动了“反欧美现代”或“超现代”的思想潮流。而40到50年代出现的马尔库塞的“拒绝的思想”和弗洛伊德左派W·莱赫的“自我否定”等等，之所以在60年代被重新评价而带有巨大影响，也正是以此为背景的。⁶⁷

竹内好在1960年前后发表的“近代的超克”和“作为方法的亚洲”等文章，与法农提出“诀别”几乎处在同一时期，其对日本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也绝非偶然。⁶⁸当然，竹内思想的关键在于对欧美的现代进行“挣扎”（抵抗），而法农的“诀别”和马尔库塞的“拒绝”带有不同的含义。但是，挣扎和诀别之间不过一纸之隔，因为“诀别”的第一阶段必然伴随着抵抗。正是由于抵抗、期待、“出卖”的反复和交错所带来的挫折，才最终导致了“诀别”。另外，在对于欧美现代不抱任何期待的意义上，“挣

扎”与“诀别”并无不同。两者都是亚细亚摆脱成为欧洲的奴隶的唯一出路。两者的差异在于，“诀别”并非只是在放弃期待的同时进行“抵抗”，而是采取“绝对的拒绝、绝对的对抗”，“挣扎”则是要求在对失败保持自觉的基础上“持续抵抗”，也就是说，它仍然停留在“欧美现代”的框架内，是一种“坚持抵抗”的方法。

在我看来，进入60年代以后，竹内好在立足于“挣扎”的同时，也开始迈出一步进行“诀别”了。1959年，他意识到对40年代前期曾经考察过的有关战前日本的“近代的超克”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可以说是一个迹象。这一点当然与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密切相关。下面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总结再论竹内好的现代意义。

[XI]

结语：“日本民族主义”的前景

——“有根”与“无根”——

1972年7月，田中角荣执掌日本政权，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论”。作为旨在彻底解决60年代以来的环境污染、农村凋敝和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等问题的一项宏大方案，通过建设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网、大规模城市居住区等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浪潮，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竹内在1951年提出“国民文学论战”之后，曾希望借助于掀起抵抗“欧美现代”的浪潮来实现日本战后的“新生”，同时通过“新生”迎来“日本民族主义”的脱胎换骨，但是，这一期待和展望在70年代前期的“列岛改造”浪潮中彻底沉寂了。

同样，以1970年为转折点，经过“70年安保”的终结、“全共斗运动”的崩溃，以及“联合赤军事件”等，60年代一度高涨的对战后“日本现代”的批判、反欧美现代以及“超现代”性的思潮和运动开始急剧消退，日本社会进入了“思想的冬天”乃至无思想的时代。

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在战后曾经

坚持与君临世界的美国对抗的中国突然与其握手言和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推动了上述事态的演变。进而，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波尔布特的大屠杀和文革真相的暴露等等，致使“亚洲的形象”如落日般暗淡。

当然，在亚洲的形象趋于黯淡的反面，正如松本健一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出现了“亚洲的崛起”即NIEs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但是，这一成果是在亚洲接受了对于欧洲现代文明的失败，并放弃了抵抗和诀别之后取得的，用竹内的话来说它是以“丧失自我”为代价的。

在这种背景下，中尾佐助和上山春平等人60年代提倡的“日本照叶林文化论”⁶⁹在70年代末期逐渐受到认同，到了80年代，青木保等人则将国际化过程中“日本的崛起”看作是一定程度的“对现代的超越”，重新提出了与欧美现代文化不同的“日本固有的现代文化”的问题。

这一状况与40年代前期京都学派基于明治以后日本物质近代化的成功而提出通过对“近代的超克”来实现“日本的现代”相似。⁷⁰当时，竹内好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亚洲主义”称为“无思想的亚洲主义”，并认为它意味着“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⁷¹当然，它与90年代前期日趋高涨的“自豪的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特性，但在缺少抵抗的可能性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这样，在日本和亚洲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孕育出了新的民族主义的背景下，思想的冬天或无思想时代到来了。这个时代的无思想状况是在竹内所说的“抵抗”和“挣扎”急剧消失、日本和亚洲整体“丧失自我”的过程更加明显的情况下出现的。⁷²但另一方面，它也与70年代以后经济的加速度发展超过某一范围之后，如计算机革命所显示的社会时间意识惊人地高速化密切相关。从思想层面上看，这一特征也典型地反映在德里达的“解构”、浅田彰的“结构与力”和“逃走论”等后结构主义思潮当中。因为，将意识构造的永续性当作“妄想症”来加以否定的后结构主义，必然从文明的意义支持时间意识的非持久性和加速化。将婴儿丢弃